

# 文化的传统与冲突

王敏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13

# 文化的传统与冲突

王敏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的传统与冲突 / 王 敏著 .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中华学人丛书 徐传武主编)

ISBN 7-5034-1234-8

I . 文… II . 王… III . 文学 - 文化 - 研究  
IV . K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6169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山东旅科印务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韩淑芳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75 字数: 18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插页: 2 页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34-1234-8/K·0853

定 价: 16.20 元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印刷厂负责退换。

# 序

宋遂良

王敏同志是一家理论刊物的编辑,是一个甘为他人作嫁、文静而多思的编辑。我们是在一个会议上认识的,因为诸多的“英雄所见略同”而有了日后的交往了解。作为一个编辑,她给我的印象是认真负责、热情而不失原则性。记得有一年她向我约稿,我和施战军同志合写了一篇评议当代文坛的近万字的文章,却因为其中的某些观点为那时的气候所不容而最终被“枪毙”了。王敏一再向我们道歉,看着她欠意万分的样子,我化用歌德的一句话安慰她说:理论是枯燥的,而编辑之树常青。之后,她再没跟我约过稿,倒是我有些别人的稿子找她帮过忙,有的稿子得到认可,有的依旧退回来。

王敏是个敬业的编辑,我见过她修改的文章校样,所下功夫不是一般人料想的到的。所以,她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摆在第二位,“行(编辑)有余力,则以学(写作)文”。即便如此,当我看到收集在这部文集的18万字的论作时,仍能感到它的意义和分量,诗意与激情(自然也有遗憾和不足)。

王敏感兴趣的、涉猎的、研究的学术领域很广,从先秦诸子到东西方文化比较,从阮籍、武训、张炜、王朔到拉美文学,从文

化建设、人格建构到台港澳现代文学：古今中外，文史政哲都包含在内。这种广泛的涉猎和兴趣，常引来某种触类旁通、气宇轩昂的学术勇气，纵横排闼、扑面而来的叙述激情。如收入集中的《诗之气韵德之人生》，《新写实小说与现代人意识》，《再塑英雄再塑自我》，《百年变迁中的香港文学》等，都是有开拓、有新意的好文章。

时间长了就会发现，王敏是个很努力的人，她对她的研究对象有热情，有好奇心，也很下功夫。为了研究港台文学，她曾于暑热之中在北京图书馆泡了半个暑假。回来后，言及此行，她疲惫中流露出更多的兴奋和满足，当时我就想，像这样沉下心来搜集、整理第一手资料的研究似乎不多见了。这种如同文学创作般的全身心投入，常使她有新的创见和发现，例如书中提到的东西方诗歌的发展差异，早期华夏民族伦理观的早熟；例如她认为香港文学的探索性对于大陆文学的参照意义，例如她说新写实小说把根扎在经济基础变革的土壤，如同“大包干”一样，把虚假的文学一下拉回到现实的大地……都是发人思考的。王敏的评论，没有教条，没有泡沫，没有学院派的架势，她把学术和现实、和人生结合了起来，与作品中人物的心是通的，不飘，不虚，文字秀丽，文风朴实，笔端常带感情，体现了她所特有的细腻和真诚。

王敏曾跟我讲，她最缺乏理论思维，写东西常是凭感性，故而对于自己常有责备。我虽然不赞成人人都去做理论家，但也愿意指出文章在理论深度及逻辑纬度上的欠缺。这样讲并非要她改变写真性情的风格，惟希望在今后能有自己新的突破。

2002年7月24日凌晨

## 目 录

序 ..... 宋遂良

### 第一辑

《诗经》与华夏民族的道德人格文化..... ( 1 )  
诗之气韵 德之人生  
——由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看东西方文明..... ( 11 )  
阮籍的诗歌创作意识与艺术成就..... ( 29 )  
传统文化的历史嬗变与现代人格建构..... ( 38 )  
澳门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 ( 50 )

### 第二辑

自我实现中的创痛与超越  
——观王朔的几篇小说..... ( 60 )  
新写实小说与现代人意识..... ( 68 )  
再塑英雄 再塑自我  
——观近期新写实小说对人物形象的把握..... ( 80 )

浓泼重洒 凄婉悲怆

- 读《家族》…………… (90)

现代人的情怀与尊严

- 《此情难言》读感…………… (95)

百年变迁中的香港文学…………… (100)

论刘以鬯的“实验小说”…………… (113)

新感觉派小说的文化透视…………… (126)

拉美文学的崛起及相关特征…………… (138)

影视的消闲消费性与艺术品位…………… (144)

### 第三辑

从毛泽东的文艺观、文化性格看《武训传》的当代命运 … (149)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的不懈探索…………… (169)

江泽民文化思想探论…………… (185)

人格建设应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 (196)

关注社会转型期中的党政干部人格问题研究…………… (209)

唯物史观与人的全面发展…………… (219)

后记…………… (231)

## 《诗经》与华夏民族的道德人格文化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般认为《诗经》中的作品大致产生在周代初期至春秋中期（约公元前 1122 年至公元前 590 年）这个阶段。当历史穿越了近 30 个世纪之后，打开这部厚重的诗歌古籍，其丰富细腻的情思、率直朴实的民风、比兴相连的意象、抑扬顿挫的韵律，依然在重重地拨击着人们的心弦，使人穿过茫茫历史烟尘，不断谛听到那来自上古祖先的一声声心曲的幽叹。……人类从荒蛮演进到文明，世界上一些古老的民族在各自不同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能够突出反映本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文化精神实质的文学体裁，例如古希腊的史诗和戏剧，古埃及的故事和宗教诗等。今天，我们阅读《诗经》，从这部浸润着华夏文明的诗歌总集里所能鲜明感受到的历史的文化特质，又是什么呢？



为了阐述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简略分析一下古希腊文化的某些特征,来作为参照。希腊史诗,享誉世界文坛,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高度称赞其永久的艺术魄力,“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从《荷马史诗》与希腊戏剧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希腊艺术的独特风采:主人公的英雄品格,曲折传奇的情节,充沛的悲剧精神,还有宏伟的结构、浩瀚的篇章。同样,由此入手,又可以深刻感受到当时古希腊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心理特征,即英雄传说文化与尚武文化心理。此时的希腊人崇尚英雄,崇尚一切具有巨大征服力量的主体和客体,乐于在成功的欣喜与失败的巨痛中接受洗礼,这一点从他们对战争、女性、命运等的描写和态度上,可以较清楚地得以说明。在希腊人看来,战争是壮烈的,战争具有强大的征服力,是展示人的英雄品格的最合适的场所,与此相类似,男性对于女性的倾倒和占有,似乎也是英雄品格中不可缺少的。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命运更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人间所有的灾难、幸福、爱情等都不可抗拒地接受命运的支配。法国19世纪的著名文艺批评家斯达尔夫人说:“希腊人从来没有表现过,也从来没有体会过人性中的第一个情操——爱情中的友谊。他们所描绘的爱情是一种病症,是神安排的命运,是对所爱的对象没有任何伦理关系的狂热。”<sup>①</sup>的确如此,在希腊史诗和悲剧中,我们

---

<sup>①</sup> 斯达尔:《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可以看到他们为了争夺一个美丽的女性而狂热地卷起一场战争,看到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私情而残忍地杀死亲生儿女,看到人们如何难以摆脱命运的控制而最终得到弑父妻母的严酷结局,但是,却很难从中看到隐含在这一切之中的善恶的、伦理的、道德的判断和评价。因此,“在那个时代的希腊作家的作品中,德行这个字眼并没有积极的意义。”<sup>①</sup> 作为处在“人类童年时代”的希腊人,他们的艺术正是特定社会“幼稚形式”的反映。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赞美的在人类童年“发展的最完美的地方”所展示的“儿童的天真”与崇高吧。

与上述情景不同,崛起在东方的华夏民族文化则显示了别样的精神风貌。《诗经》三百余篇诗歌,有叙事诗,有抒情诗,《风》多为抒情类,《雅》与《颂》多为叙事类。从写作年代上看,据古今学者考证,《周颂》、《大雅》属于前期作品,《国风》属于后期作品,整部《诗经》反映了5个多世纪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和各阶层人们的思想感情。从诗歌中已不难看出,当时的周朝邦土已是较为稳定的、以小农生产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氏族社会,这个社会的成员不仅有着较为安定秩序的生活,而且从这种有秩序的、等级制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制约人们行为方式的准则与规范,它反映在国家制度上,即是所谓的“周礼”,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与情感中,就是人们的社会伦理关系与社会道德观念。与希腊艺术不同,《诗经》所展示的华夏民族的文化精神,就表现为这种伦理的、道德人格的历史特质。

<sup>①</sup> 斯达尔:《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 二

吟读《诗经》，能够给我们以强烈感染的，是那些各阶层的人们于古老的黄土地上生发的浓烈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人们的这种炽热率真的生活情感，已经不完全是原始性的快活感，而是更多地融进了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教训，是更多地隐含了对一些行为的善恶是非的审视和评判的了。总起来看，人们已冲脱了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的文化氛围，将目光转向了最为现实的人生之途。他们歌咏辛勤的劳动、人情的美好；哀怨个人的不幸、国家的创伤；赞美德行醇厚、公正善良；讽刺不劳而获、巧言伪善；而至于那些贪婪残暴、乱伦、殉葬等行为，更在抨击鞭鞑之列。自然，人们也歌咏战争、献身战争，战争依然有着“伐鼓渊渊，振旅闐闐”的豪壮和“如霆如雷”的激烈。但是，除此之外，战争也给人们带来亲人别离的忧伤与“仆夫况瘁”的劳顿。此时的华夏民族，正在用抑郁的目光注视着战争，对具体的战争有了细腻的个人感受和情感判断。“我阻东山，滔滔不归。……制彼裳衣，勿士行枚”<sup>①</sup>，“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sup>②</sup> 前往征战的兵士们虽然能够理解“王事多艰”，也为强大的军威所激励，但是他们心里更挂念家中的亲人和农事，深刻体验到了战争带给他们的痛苦与灾难，而流露出明显的恶战情绪和厌倦心理。总之，无论是平民奴隶还是王侯贵族，无论是生活细节还是战争行

---

① 《诗经·幽风·东山》。

② 《诗经·小雅·采薇》。

役，在诗歌的王国里，它们都要一无例外地接受人们情感的品评，接受着善恶与否、是非如何的说道与评判。

《诗经》中表现人们恋爱婚姻的诗歌，是体现人们这种善恶道德观念的一个最生动的领域。《豳风·伐柯》中“伐柯伐柯，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的歌咏，已显示了当时婚姻的礼节制度。《周南·关雎》这首久负盛名的情歌，则完美地体现了当时人们对纯真爱情的讴歌与追求。——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中歌咏的男女情爱，似乎褪尽了原始的形式而获得“人性中的第一个情操”，而且诗歌中的人物也已经具有了道德审美的内涵，诗中的“窈窕淑女”已是“君子”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和审美标准筛选出的意中人。有注释云“秦晋之间，美心为窈，美状为窕”，也说“善心为窈，善容为窕”，“淑”更是对既美又善的人的称谓，《诗经》中类似称呼如“静女”“美人”“姝者”等，都是此意。可见，《关雎》中的女子不仅美丽动人，而且善良娴淑，“君子”对她的爱慕，也就根源于这种对善美合一的审美体认，所以他才有了那种“寤寐求之”、“辗转反侧”的强烈而细腻的爱情感受。在《诗经》的《国风》部分里，人们对这种绵绵情思的描绘是很多的，例如那种“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的缠绵依恋，“未见君子，忧心忡忡”的牵肠挂肚，“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的坚定专一，“无谗我里，无折我树杞”的羞涩，“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焦灼，“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的甜蜜赠答等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邶风·蒹葭》这篇美丽的恋歌，不仅唱出了作者绵渺无尽的情爱，而且烘托出如歌如画、如思如梦的意境，堪称《诗经》爱情诗歌的压卷之作。另外，还有一些反映不幸婚姻的作品，诗中所流露的被遗弃后的无限哀怨，对负心人的

良心谴责,对婚嫁不能自主的一腔愤闷和对他人的真诚劝诫,均是情感浓烈,意味深长。对于《诗经》中这些反映婚姻恋情的诗歌,如果撇开其历史的环境单就情感因素而言,竟是与今天的现代人相差无几,这正说明了当时人伦关系、婚姻观念、礼仪制度的稳固和成熟。因为,在一定的风俗礼仪、社会心理、道德规范尚未形成之前,在人们的性行为还没有善恶标准和道德力量规范的时候,是很难产生真正的爱情情操的,当然也就不会拥有由此而来的各种复杂细腻的爱情感受了。

《诗经》中还有一类作品为今人所重视,那就是反映下层百姓对权贵们道德评判、操行规谏的诗歌,即通常所称的怨刺诗、讽喻诗。对于这部分作品,过去多是从阶级反抗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如果我们转向文化的视角,我们还会看到周代文化所具有的道德礼仪的特定内涵,看到这种文化对于整个社会成员的全身心的涵盖与渗透。在那个时代,在每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角色的位置上,人们都已经承载着与之相对应的礼仪方面的、道德方面的制约与要求,社会的心理与舆论要求各个阶层的成员与这些承载相吻合,二者出现了悖反,就要出现公众的舆论加以干预。在这种文化的氤氲中,赞美先王圣德、抨击王道昏庸、讽劝当朝人物的诗歌也就得以破土而生。《邶风·相鼠》是一篇谴责无德无礼之徒的诗歌。“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诗歌中的激忿情感如火如荼,率直泼辣,其对无耻行为卑视难容的程度,着实令人惊叹!这首诗所表现出的愤怒情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这个时期的人们,已经把人的自身存在与人应遵从和具备的社会道德准则并列、统一了起来,看到了人的生存价值

之外的另外一种价值,而更加否定败坏的人格,向着注重个人的德行修养、看重自身人格尊严的方面发展。《邶风·燕燕》这首诗,抒发了作者对所送的人的依依不舍。诗中称颂那个人在人格德行方面的浑厚涵养,“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邶风·柏舟》描述的是一个遭受遗弃的妇女的忧愤情怀,尤其讲到了“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因为人人都有各自的人格尊严,不可随意让人欺侮,她才为自己不平的遭遇而“耿耿不寐”“寤辟有悫”(双手捶胸有声)。还有《小雅·天保》中对君主“群黎百姓,偏为尔德”的祝福,《秦风·小戎》中妇人思念远征的丈夫,对其“厌厌良人,秩秩德音”的怀念赞美,还有《雅》《颂》里更多的对有德之人的歌颂褒扬,对无德之人的怨怒讽谏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周代社会人们较强的讲究人的人品德操、人格威仪的文化意识。

自然,上面所概括阐述的,是就《诗经》体现出的主要的文化精神而言。事实上,一部《诗经》,可以说以它众多的篇幅、生动的形象、细腻的情感,最早、最完备地反映了早期华夏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达,并且这种文化的繁荣,是包含着很强的娱乐、抒情、审美的本义的,即便是隐含在诗歌情感中的善恶观念、道德教训,也洋溢着人们追求生活幸福的果敢,表露着人们自由泼辣的性情。应当说,《诗经》的出现,既是社会历史生活的产物,又为后来中国文化的发展铺设了一块神圣的基石。

### 三

《诗经》在中国诗歌及整个文化发展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可以设想,假如没有任何历史的机遇,上述

《诗经》所体现的早期汉民族的文化精神也许仅仅属于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然而，一位巨人出现了，他发现了这块基石，经过他的苦心雕琢，《诗经》才成其为今天的《诗经》。这个人就是被称之为中国先哲的圣人孔丘。

孔丘的时代距《诗经》最晚的诗歌年代，也已相隔了半个多世纪。那时的中国，诸侯分立，礼崩乐坏，周王朝的一统天下已经名存实亡。置于乱世之中，如何安邦治国、恢复文明的社会秩序，是孔子苦思冥想的首要问题，负有强烈使命感的孔子就是从这样一个政治家的角度，发现了“诗”的重要社会价值。“《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sup>①</sup>在孔子看来，《诗经》中所蕴含的周代文化精神，最为符合他以伦理道德的规范来复苏和营造礼乐社会秩序的构想。这样，经过“思无邪”的概括和删削，《诗经》便纳入了孔子感化民心、促其温柔敦厚的政教体系，成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sup>②</sup>的一部全面的社会教科书。所以，孔子这样教训他的儿子，“不学《诗》，无以言”<sup>③</sup>，“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sup>④</sup>。不学《诗》便无法说话，不学《诗》便如同对墙而站，一物无所见，一步不能行。这就是孔子对《诗经》的价值判断。

孔子把诗歌纳入教化，概括讲分为两个层次。首先，处在周王朝大势已去的环境，孔子曾有“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sup>⑤</sup>的感叹！这很能反映当时孔子的

---

① 《论语·为政》。

②④ 《论语·阳货》。

③ 《论语·季氏》。

⑤ 《论语·述而》。

心境。因此,孔子教化的第一步,就是要使人们识礼、识德,明确善恶是非,掌握价值尺度。他对《诗经》“思无邪”的释义,把诗三百完全划入了“正”和“礼”的范围,使《诗经》又具备了展示礼仪规范、恒量是非曲直的最高权威。孔子经常引“诗”来评判人物事件,将《诗经》中的章句视为人们行动的准则、处世的格言,甚至作为评断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依据,这都是为了强化《诗经》的道德教化作用。据有关学者统计,《论语》中谈《诗》有 18 次,引《诗》10 次;《左传》中引《诗》的事例达 118 次,直接见于《诗经》的有 84 篇。这说明了,以《诗经》作为道德礼仪标准,用《诗经》章句评判社会生活乃至作为国家的外交辞令,在春秋时期已是一个较为自觉普遍的现象。这无疑增强了《诗经》对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

出于对社会与人的执着思考,孔子又看到了外部力量于人的局限性,看到了仅仅依靠社会教化的软弱与被动,从而在形而上的层次把政教引入了人的心灵自省的阶段。孔子的道德观念是最富有自我实践性的,他要求不但评判别人,也检验自己,不但求诸外形,更求诸内心,以反省内修的方式实现自身道德的完善,以日常的人伦生活作为道德实践的课堂。这样,社会的伦理道德便不仅仅是一种关系,一种观念,更是一种体验,一种境界,是一种贯注于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内在精神,一种表现为伟大而又平易亲切的人格气质。因此,孔子特别讲究感悟和内省,讲究启发联想和悟性的积累,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孔子的诗教更多地带上了自身的领悟、性情的再造的特点。每当他的学生闪现了这种论诗的感悟的时候,孔子总是兴奋不已地夸赞:“始可与言《诗》已矣”!

显而易见,孔子的论诗及其诗教活动,带有明显的政治功利



色彩。孔子不仅有效地突出了《诗经》的社会地位与功能,而且也无限地扩展了诗中蕴含的伦理道德精神,甚至开启了对《诗经》任意附会穿凿、断章取义的历史绿灯。经过孔子,尤其经过汉代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定位,作为“六经”之首的《诗经》,也就更多地失去了诗歌审美、抒情的意义,同时也大量地失去了诗歌中原有的感情形态,而带着历史不断赋予它的光环,与中国儒学文化的传统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